

多元视角与文学文化

——古典文学论集

博学
文库

BOXUE WENKU

曲景毅 李佳/主编

本书围绕『多元视角与文学文化』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叙事学、文化学、考据学、版本学、民俗学及互文性、文体互动、文本英译、西方汉学研究综述等多个领域，既有文学文化式的观照，又有文本细读式的体悟，旨在以多元视角展示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多元视角与文学文化

——古典文学论集

博学
文库

BOXUE WENKU

曲景毅 李 佳/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视角与文学文化:古典文学论集 / 曲景毅, 李佳主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 2
(博学文库)
ISBN 978-7-5664-0722-1

I. ①多… II. ①曲…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623 号

多元视角与文学文化——古典文学论集

duoyuan shijiao yu wenxue wenhua; gudian wenxue lunji

曲景毅, 李佳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 bnupg. com. cn
www. ahupress. com.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20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664-0722-1

策划编辑: 卢 坡
责任编辑: 卢 坡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张同龙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绪 言

本书围绕“多元视角与文学文化”这一主题,收录 13 篇学术论文(9 篇中文,4 篇英文),作者分别来自新加坡、美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内地等地域,研究的时代涵括先秦、汉魏、南朝、唐、宋、明、清等各个时期,研究的文体包括诗、词、文、小说等诸种体裁,内容涉及叙事学、文化学、考据学、版本学、民俗学及互文性、文体互动、文本英译、西方汉学研究综述等多个领域,既有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式的观照,又有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式的体悟,旨在以多元视角(Multiple Perspective)展示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面向。

现大体依据研究主题的时代顺序,扼要介绍每篇论文的主旨如下(先中文论文,后英文论文):

《国语》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但对该书的文学性探讨有欠深入。李佳博士的《〈国语〉的叙事与说理》一文从叙事和说理的角度进行析论,提出《国语》于事中记语的篇章结构,使得每篇能以一事为起讫,因而在叙事的完整性上具有优长;在具体的写作上,该书善设伏笔,常常运用铺排、渲染之法欲抑先扬,从而使得情节曲折,富有波澜。《国语》一书擅长说理,观点

明确、议论透辟、逻辑严谨；注重论证，娴熟地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言辞富艳铺张，亦不乏虚构与夸张。在行文上，《国语》常有讽刺幽默、绵里藏针者，其文风韵藉婉转、意味悠长，这些都为后世古文家所称许和借鉴。

对于《毛诗故训传》题名的解释，一般认为“故训”是解释字词，“传”为揭示义理。王振华博士的《〈毛诗故训传〉名义新考》一文尝试将“故”、“训”、“传”等解经体例还原到其产生年代，结合先秦、汉代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重新考察这一问题。本文认为，“训故”是汉代的一种解经方法，由此产生的著述被称为“故”。“训故”一词的出现及“故”正式成为一种解经体例，应在汉武帝之后。“训”是先秦一种重要的文体，本义是以先人德行为典范，后引申出“说教”、“解释”之义。《毛诗故训传》之“故训”指毛亨之前儒家对《诗经》的说解。《毛诗故训传》的题名之义是，毛亨根据先儒说解为《诗经》所作之《传》。

魏晋论说文中常见的喻词有譬、譬如、譬犹、何异等，不同的喻词蕴含不同的语气和色彩，更多的譬喻可能无需喻词，本体和喻体之间仅靠句式的巧妙衔接。王京州博士的《以近譬远与罕譬而喻——魏晋论说文中的譬喻》一文认为魏晋论说文中大量使用金、木、水、火、土为喻体，反映了譬喻由近及远、以小譬大的特点，譬喻能使论说文的语言更为洗练，在此期论说文中的反复运用使许多蕴含丰富的成语固定下来。喻证的功能是有限的，存在着譬喻不恰当的风险，不能取代逻辑推理，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论敌抓住把柄，因此论说文的譬喻必须注重严密性，“罕譬而喻”理应成为论说文的追求目标。

谢混是东晋末年陈郡谢氏代表人物，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高静博士的《南朝诗家谢混初探》一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还谢混本来面目，进而还原晋宋之际的历史。从谢混行为入手，分析其性格，了解其政治上“破家”的原因；考察谢混婚姻始末，得出王、谢关系的真实情况；从谢混诗歌分析，认识谢混

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

曲景毅博士的《论张说之尚奇与传奇》分别对张说文章鲜明之尚奇特色与其传奇创作进行解析,并指出二者在创作倾向上呈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张说的大量碑志行状透露出浓郁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张说以散体古文笔法书写传奇小说。本文对《虬髯客传》作者的争议进行了比较推论,结合其文章尚奇的特征,认为原作者应属张说较为合理。张说不但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亦是唐传奇创作臻于成熟的代表。

宋词中存在拟女性心态的作品,英译本中也收录众多。但由于译者在对该类宋词理解上的差异,他们对原文视角和文本中的模糊性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刘颖女士的《英译宋词中拟女性心态的处理》旨在对该类宋词的英译做出更进一步的探析,并比较不同理解下对女性视角和女性心态的处理。

王建生博士的《论南渡文人的京洛记忆与文学写作》一文指出,南渡文人在“京洛”这一语汇上,叠加了多重内涵,地理的、政统的、文化的、历史的等等。本文认为对京洛旧事、旧人的追忆,成为南渡文学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有关“京洛”的文学作品,丰富而生动地呈现了宋代文学的新主题:国耻遗恨的集结与发抒,反思亡国教训,新场境与旧阅历间的纠葛,传承中原文化的自觉等等。对这一现象的梳理,既有助于我们剖析南渡文人的文化心理,也助于我们把握南宋前期文学的创作基调。

晚明之世,通俗文学日益兴盛,各种拟话本集如“三言二拍”、《西湖二集》、《石点头》、《型世言》等先后面世。整体来看,这些拟话本的主角以社会中下层人物居多,然亦包括一向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帝王如梁武帝、隋炀帝、唐玄宗、后周太祖、宋太祖、宋高宗、金海陵王等,或叙述帝王发迹前的平民生活,或以读者较为疏离的宫廷世界为背景,或为宗教劝导,或为政治宣传,或为历史评说,或为宫廷猎奇,多取材自正史、稗史、文言小说、戏曲、宗教书籍等。对于这些材料,作者或吸纳与烘染之,

或采撷与重写之,或移录与拼接之。《醒世恒言》卷二四《隋炀帝逸游召谴》及《西湖二集》卷二《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即采用了移录与拼接之法。赵景深指出,《隋炀帝逸游召谴》篇乃《隋遗录》、《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传奇合成,大部分运用原来的文言。胡士莹以《宋高宗偏安耽逸豫》篇本自《武林旧事》卷七及《西湖游览志余》卷三;曾庆全则谓此篇“文风较古朴,许多段落抄录前人的原文”。且赵氏谓《隋炀帝逸游召谴》篇组合上颇费匠心,曾氏称《宋高宗偏安耽逸豫》篇“一个个事件交代清楚,轮廓分明,渗透著作者的爱憎感情”。陈炜舜博士的《移录与拼接:互文性视域下的拟话本帝王故事》一文以这两篇拟话本为基础,从互文性视域探论其文本建构的过程及得失。

叶楚炎博士的《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婚:情节建构与小说叙事》一文认为“赘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而小说中的赘婚又出入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体现了超越固有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某种潜力,在情节建构与小说叙事方面尤其如此。小说作者从赘婚中获得了天然的便捷,可以从女性的立场去营造情节、叙述故事;赘婚中存在的种种常见困顿,反而为作者提供了便利,在小说中都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若干层次;对于赘婿来说往往意味着尴尬和屈辱的婚仪、改姓以及逐婿,在小说里也成为故事情节的重要来源。以至于在赘婚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小说不是悲剧,而是充满了谐趣以及励志色彩的喜剧或是正剧。赘婚变为小说中最让人兴奋的情节元素之一,并进而成为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一个要素。在促使小说中的人物“发迹变泰”的同时,赘婚也完成了自我的华丽转身。

曲景毅博士、李佳博士合撰的《〈国语〉宋公序本刊刻考》(Textual Research on the Gongxu Edition of *Guoy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英文论文对《国语》宋代公序本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留传至今分藏于海峡两岸的三部《国语》的刊刻实际,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公序本《国语》是北宋英宗时在国

子监最早刊刻的；在南宋的两次刊刻分别是在高宗和孝宗朝。

历代关于《史记》的研究汗牛充栋，李佳博士、曲景毅博士、刘颖女士三人合撰的《论〈史记〉中无传的楚汉谋士》(On Subsidiary Chu-Han Advisors in the *Shiji*)英文论文独辟蹊径，围绕楚汉时期那些在《史记》中没有传记的谋士、辩者展开，通过比较刘邦、项羽对待小谋士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探讨汉胜楚负的原因；并从汉初几位大功臣的遭际，探讨小谋士在楚汉战争以及汉初立国这一特殊时期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最后简析司马迁在记载这些谋士时所体现出的高超笔法。

秦瓊博士的《西方唐代口传文学研究》(In Search of Tang Oral Literature: A Short Review of Western Studies)英文论文对西方关于唐代口传文学的研究进行总结和介绍。从 Walter Ong, Milman Parry 和 Albert Lord 的关于口传文学提出的概念和理论出发，介绍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对这些理论应用的不同见解，及唐代文学研究中涉及口传文学的方面。本文认为唐代诗歌的写作和流传与记忆和口传文化密切相关，唐传奇的起源和背景也根植于口传文化中“说话”的表演艺术。唐代传记、笔记以及史料记载中也多有采用当事人口述的见证和经历的例子。

“讽喻”(allegory)是西方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Charles Hartman(蔡涵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指出“讽喻”是儒家阐释学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影响了诗歌的笺注者，也启发了众多诗人。蔡涵墨进而认为浸润于这种创作与阐释传统中的唐代文人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中也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讽喻”模式。邹昕博士的《讽喻与唐传奇研究》(Allegory and the Study of Tang Tales)英文论文对“讽喻”这一概念在北美唐代小说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评述。论文简要梳理了“讽喻”这一概念在北美中国学研究中的运用情况及相关讨论，以 Glen Dudbridge(杜德桥)、William H. Nienhauser

(倪豪士)等西方学者的研究为例,具体探讨了“讽喻”作为一种文学阐释工具如何被运用于唐代小说研究之中。最后探讨了这一研究思路在唐代小说研究中的理论价值与局限。

2013年3月8~9日,我们邀请上述年轻同道组成“多元视角下的中国古典文学论坛”(Panel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赴香港参加香港亚洲研究学会(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SAHK)第八届研讨会,经协商我们决定出版此次研讨会的论文,以飨学界。

李白有诗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商隐有诗云:“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青于老凤声。”“后生”、“雏凤”们不敢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但求学界前辈师长能够提携指点一二,并祈请诸位方家不吝赐正,感激之情铭记于心。

还要感谢安徽师范大学丁放教授的大力推荐,感谢本书的编辑卢坡先生的辛勤工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

是为记。

编者

2013年5月

目 录

绪言	编者〔 1 〕
《国语》的叙事与说理	李佳〔 1 〕
《毛诗故训传》名义新考	王振华〔 23 〕
以近譬远与罕譬而喻——魏晋论说文中的譬喻	王京州〔 38 〕
南朝诗家谢混初探	高静〔 53 〕
论张说之尚奇与传奇	曲景毅〔 74 〕
英译宋词中拟女性心态的处理	刘颖〔 93 〕
论南渡文人的京洛记忆与文学写作	王建生〔 116 〕
移录与拼接:互文性视域下的拟话本帝王故事	陈炜舜〔 137 〕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婚:情节建构与小说叙事	叶楚炎〔 182 〕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Gongxu Edition of <i>Guoyu</i>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QU Jingyi & LI Jia〔 199 〕
On Subsidiary Chu—Han Advisors in the <i>Shiji</i>	LI Jia, QU Jingyi & LIU Ying〔 219 〕
In Search of Tang Oral Literature; A Short Review of Western Studies	Amelia Ying Qin〔 252 〕
Allegory and the Study of Tang Tales ...	ZOU Xin〔 278 〕
本书作者简介	〔 307 〕

《国语》的叙事与说理

李 佳

《国语》是先秦散文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它直接继承了《尚书》的记言传统，吸收了《春秋》微言大义的写作手法，并且借鉴了《诗经》十五国风分国编纂的体例，形式独特、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但是较之《左传》，《国语》一书的文学价值似乎并不为学者们所重，见诸各种文学史的篇幅有限，专门性的论文也不多^①，总体说来，目前的研究仍基本局限在叙事性较强的《晋语》和《吴语》、《越语》，特别是骊姬夜泣、重耳流亡、鉏麇触槐等有限的几个篇章，可以说是有欠深入的。本文从叙事和说理的角度，对《国语》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进行析论。

^① 较早的论文是谭家健先生的《〈国语〉的文学成就》，《江淮论坛》，1983年第6期，后收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98～210页。另外一篇专论是陈桐生的《〈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第4～13页。

一、语在事中

《国语》二十一卷，分别记录了从西周中叶到春秋、战国之际各国的历史片段，诸篇长短不一，彼此独立为文，基本按照时间先后编排。虽以记“语”为主，但亦兼及所涉事件，人物的言论均有叙事框架作背景，则“语”为事中之语，因此不少篇章可以见出作者在叙事技巧和情节安排上的巧妙构思。《国语》的篇章结构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一般都由背景、言语、结果或尾声组成^①。背景交代引起言语的原因，介绍事件缘起；言语是人物就背景中的事件表达意见，结果是听者对言语作出的反应，可能赞成，可能反对；如果此前的言语是带有预言性的，那么篇末就会出现尾声，其内容是对前面预言的历史回应。与《春秋》以及《左传》的编年记史不同，这样的写法实为后世纪事本末体不祧之祖，它使《国语》能以一事为起讫，完整叙述其始末，文学性由此增加。譬如《晋语五》“宁嬴氏论貌与言”篇：

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举而从之，阳子道与之语，及山而还。

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从之，何其怀也！”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外易矣。若外内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历时而发之，胡可渎也！今阳子之情谄矣，以济盖也，且刚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

^① 有关《国语》的篇章结构特点，参见笔者《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71～78页。

所聚也。吾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是故去之。”

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子死之。^①

该篇的“背景”介绍晋国大夫阳处父路过宁邑，住在宁嬴氏处，宁嬴氏认为阳子是位君子，决定追随他，于是告别妻子随阳子同行，不料却很快中途折返；“言语”部分是宁嬴氏与其妻的对话，解释他离开阳子的原因，并预言阳子将遭遇灾难；“尾声”叙述一年后阳子果真死于非命，证明了宁嬴氏的预言。虽以记语为主，但全篇亦包括了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篇幅不长却是主题集中、情节剪裁得当。《左传·文公五年》也记载了这件事：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于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②

《左传》依年记事，因此在文公五年只有宁嬴氏对阳处父的评价以及预言。到了“文公六年”，晋国发生“贾季之难”，《左传》对之予以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两相比较，《左传》编年体的写法，虽然便于清晰地了解春秋时期诸国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和时代背景，但对有密切关系但相隔一段时间的事件首尾难以追踪，就这一点而言，编年体显然不及纪事本末叙事完整圆满。显然，《国语》的这种结构在文学叙事上是具有优长的。

除了整体结构的特点外，在具体的写作上，《国语》也有诸多巧制，许多篇章都写得十分曲折、生动。即如上面所举之例，

① 《国语》，卷一一，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本。除特别注明者，本文所引《国语》皆据此本。按：有关《国语》版本的辨析，参见笔者《〈国语〉版本研究》，《国学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7～387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40～541页。

《左传》记“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文字简洁，但只如流水账一般的平铺直叙。同样的事件，《国语》则采取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增加了宁嬴氏对希望追随君子这个夙愿的表达；而一个“举”字活现出宁嬴氏初见阳处父的兴奋之情，以及毫无迟疑的追随举动。这些就与之后宁嬴氏才至温山就返家的举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矛盾，读者自然会好奇：宁嬴氏缘何对期盼很久才如愿以偿的事情这么轻易就放弃？就如其妻所说：“子得所求而不从之，何其怀也！”伏笔的巧妙安排促成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情节上的波澜使其故事性和可读性都大大增加了。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国语》的篇章往往精心设计“背景”，可谓工于发端。如，《晋语九》“邰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篇：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若见垒培，是见寅与吉射也。”尹铎往而增之。简子如晋阳，见垒，怒曰：“必杀铎也而后入。”大夫辞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①

尹铎被任命管理晋阳，赵简子令其务必拆毁为抵抗荀寅和范吉射叛乱所修筑的壁垒。但是尹铎不仅不遵命反而增高壁垒，所以简子一见即大怒，要先杀尹铎再进城，情势危急。再如《楚语上》“子囊议恭王之谥”篇：

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谷不德，失先君之业，覆出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领以殁，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诺。王卒，及葬，子囊议谥。

楚王临死前对自己的谥号已有遗命，但令尹子囊却不遵从而是坚持重议，其中缘故令人不解，从而激发读者阅读下文的

^① 《国语》，卷一五。

兴趣。又如,《鲁语上》的“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篇,莒太子弑君后携宝物投奔鲁宣公,宣公贪图小利,让仆人拿公文命季文子赐给莒太子采邑,里革路遇仆人,认为不妥而擅自更改君命为流放莒太子。次日当宣公得知后勃然大怒:

公执之,曰:“违君命者,女亦闻之乎?”^①

臣子违抗君命罪在不赦,形势间不容发,似乎已无调和余地。《晋语八》“叔向贺贫”,韩宣子身居正卿之位却没有相应的财富,为此非常烦恼,叔向得知此事后特地前来道贺等等,都是引人入胜的发端。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国语》的篇幅大多不长,然而作者常在这短小的文章里(通常在篇章伊始),或埋下伏笔或安排出人意表的情节,将事件的矛盾冲突推到顶点,再看篇中人物如何通过一番言语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语”在事中的写法使得文章的戏剧性大大增强,自然也就引人入胜。

短制如此,《国语》的长篇更是注重结构的安排。公元前575年晋国在鄢陵之战打败楚国后,派郤至向周天子献捷,对此事《左传·成公十六年》有非常简单的记载:

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②

郤至居功自傲,屡夸己能,单襄公认为郤至的做法是以下掩上,一定会招致灾难,内容简单,文学性不强。该事在《周语中》“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篇则写得有声有色:

晋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庆于周。未将事,王叔简公

① 《国语》,卷四。

② 《春秋左传注》,894~895页。

饮之酒，交酬好货皆厚，饮酒宴语相说也。明日，王叔子誉诸朝。

与《左传》不同，《国语》并没有郤至与单襄公的直接对话，而是先写他到周以后与王叔简公的交往。王叔子设宴款待郤至，宾主互赠厚礼，席间谈笑甚欢。第二天王叔子就在朝堂上称赞郤至，可见王叔子对郤至的欣赏和肯定。这是篇中郤至的第一次出场，没有正面描写其人而是通过他人的肯定进行虚写，是全篇的欲抑先扬之笔。下文继续写道：

郤至见召桓公，与之语。召公以告单襄公曰：王叔子誉温季，以为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

与郤至接触的第二人是邵桓公，郤至主动与之交谈。事后邵公与单襄公谈论这件事。上文只说“王叔子誉诸朝”，王叔子称赞的内容却不得而知，这里通过邵公之口予以补充，原来王叔子对郤至推崇备至之辞，认为郤至定可晋升为正卿，执掌晋国国政，王叔子甚至规劝同僚与之交好以为日后树援。这可以算作铺叙事件的第二个虚笔。下文继续写道：

今夫子见我，以晋国之克也，为己实谋之，曰：“微我，晋不战矣！楚有五败，晋不知乘，我则强之。背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赂诸侯，二也；弃壮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郑从之，三陈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晋，晋得其民，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治整，诸侯与之。是有五胜也：有辞，一也；得民，二也；军帅强御，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诸侯辑睦，五也。有一胜犹足用也，有五胜以伐五败，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战。栾、范不欲，我则强之。战而胜，是吾力也。且夫战也微谋，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晋国之

政，楚、越必朝。”

文至此处邵公转述郤至的自白，郤至非常自负地声称，没有他晋国就不可能取得鄢陵之战的胜利。为了证明这个结论，郤至对比分析了楚国失败的五个因素和晋国制胜的五个因素，以此夸耀自己的政治识见。他还认为立有勇、礼、仁三大功劳，并对今后的政治前途高自期许。郤至虽然是在伐功，但是也说得有理有据，以致邵公听后也很佩服郤至的才能。此处实写郤至，却仍是欲抑先扬之笔。再看下文：

吾曰：“子则贤矣。抑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吾惧政之未及子也。”

谓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今栾伯自下军往。是三子也，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若佐新军而升为政，不亦可乎？将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为奚若？

邵公从晋国官员擢升制度的角度，质疑郤至的自许。对此郤至当即反驳，并举出晋国三个越级拔擢的先例，不由人不相信他的话。故而邵公才特地来征求单襄公的看法。这里继续实写郤至，其人的性格、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扬”笔亦用到了极处。单襄公听后作了如下评论：

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

此处真可谓一抑到底，如此自命不凡的人物，襄公却认为他已是死到临头，评价的陡然转变，形成了前后非常强烈的对比和矛盾。从旁人以及自我的高度肯定，前途似乎无可限量；一变而为大祸临头、生死攸关，行文节奏由舒缓而骤然急迫。

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